

曹胜高 著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编
国学研究丛刊

汉赋与汉代制度

——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赋与汉代制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曹胜高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3

ISBN 7-301-10229-1

I. 汉… II. 曹… III. 汉赋—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0718 号

书 名: 汉赋与汉代制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

著作责任者: 曹胜高 著

责任编辑: 徐丹丽

标准书号: ISBN 7-301-10229-1/I·078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2.5 印张 325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国学研究丛刊》总序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袁行霈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些有志之士努力向西方寻找救亡图存之道,西学东渐成为社会的潮流。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学者担心自己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衰微,遂又提倡国学,于是出现了关于中学与西学的各种不同观点和争论。现在我们平心静气地回顾这段历史,应当清醒地看到:国学不能救中国,也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然而,现代化并不是全盘西化,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中国的国情,国情既包括中国的现状,也包括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研究国学是很有必要的。何况国学中的确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东西,这些优秀的文明成果可以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作用。所以,对国学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必须认真面对、认真研究,应当抱着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发展的态度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研究国学不等于复古,研究国学不当抱残守缺,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抱残守缺和全盘西化都是没有出路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伟大创造,是一种从未中断过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它有辉煌的历史,曾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它的优秀部分至今仍然散发着魅力,我们应当自觉地继承。近二十年来国学研究的进展已经证明,只要踏实认真地进行研究,是可以得到学术界和社会广大群众认可的,是可以为提高全社会的人文素养,为弘扬民族精神,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的。

我们现在研究国学,一定要有全球眼光,也就是把国学放到世界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现在中外文化交流,呈现明显的入超状态,有人统计,文化的进出口比例为14:1,这未必是精确的统计,实际的情况恐怕更值

得我们注意。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日益繁荣,世界更迫切地需要了解中国。我们在广泛吸取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有责任将优秀的中华文明介绍给世界,与各国人民共享。

国学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内容十分丰富的学问,不要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如果仅仅满足于从国学中寻找某些对工商管理、金融、经济、公关等等有用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太简单化了。有人问我:研究人文,究竟有甚么用?要说没用也真没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教人如何投资赚钱。但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这是人文无用之大用。试想,如果我们的灵魂中没有诗意,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历史,我们的思考中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关于国学研究,也可以从这方面考虑。

北京大学在1992年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心于2000年更名为国学研究院。这是一个虚体性研究机构,我们以“虚体办实事”为宗旨,遵循“龙虫并雕”的方针,既从事和组织高深的学术研究,又注意做好普及工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将高雅文化普及到大众。除了编辑《国学研究》、《国学研究丛刊》、培养博士生等日常性工作外,还曾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召开过有17个国家的一流学者参加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出版了会议论文集《文化的馈赠》四卷,以及《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萃》五卷。我们还与美国有关机构合作拍摄了100集电视专题片《中华文化讲座》,在美国播出。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了150集大型系列电视专题片《中华文明之光》,在不止一个频道多次播出,并出版了讲稿《中华文明之光》,面向少年儿童的彩图本《中华文明大视野》获得国家图书奖。

《国学研究丛刊》是由北大国学研究院筹划编辑的,从1993年起陆续出版了13种。这些书都是我们资助研究或资助出版的,其中不乏名家的名著。现在北大出版社准备继续与北大国学研究院合作,用《国学研究丛刊》这个已经在读者中建立了信誉的名称为号召,向国内外学者广泛约稿,严格审阅,精心编辑,以崭新的面貌跟读者见面,使之成为足以代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水平,并能反映国内外关于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前沿的精品。我很赞赏出版社的这个设想,希望出版社持之以恒,不断推出令读者耳目一新的佳作,五年、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必可蔚为大观。

北大出版社要我为这套丛书撰序,姑且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写了下来,希望得到同道的响应。

2006年2月7日

丙戌岁元月初十

3

汉赋与汉代制度

《国学研究丛刊》总序

序 言

袁行霈

曹胜高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博士生中的翘楚,自 2002 年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以来,彼此切磋学问,过从甚密。他为人正派,诚实笃厚,勤奋好学,思维敏捷,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学者。

曹胜高的知识面比同龄人宽广,于先秦两汉之经、史、诸子相当熟悉,对礼制多有涉猎,对兵书尤有兴趣。他在国学研究院学习期间,致力于跨学科的研究,所撰博士论文《汉赋与汉代制度》兼及文学、史学两大领域,答辩时得到一致好评。

目前对汉赋的研究虽然比十年前有许多进展,但是绝大多数论著只是就汉赋本身进行分析评价,而没有从更广阔的角度进行探讨。《汉赋与汉代制度》则跳出了文学本身,既以大量的史料印证汉赋中的叙述和描写,又从汉赋的文本出发,审慎地加以考证,进而探讨汉代若干制度的细节,出入于文、史两大学科,触类旁通,左右逢源。其中,关于东汉京都赋兴起之社会背景的论述,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从汉赋的一些细节描写,考证汉代校猎制度,补充了这个制度的若干未曾被人注意的细节;从汉赋看两汉礼仪制度变迁的趋势,也很有创新性。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前身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 1992 年,于 2000 年改名,并于 2002 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我们一向提倡并组织跨学科研究,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也多选择跨学科的题目。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在自然科学界、人文社会科学界都已得到共识。我们相信,在学科的边缘上,将会出现许多新的学术生长点,从而带动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但是跨学科研究难度很大,既要立足于某一学科深入下去,又要熟悉许多邻近学科的研究现状和前沿问题。要想在攻读博士的三年时间内,完成这样一篇论文,需要相当好的基

础,也需要顽强的毅力和加倍的努力。曹胜高博士终于成功了,而且他的博士论文很快为北大出版社接受。他的大著出版在即,嘱我作序,这在我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遂奋笔写来,一气呵成,以表达我对他的赞赏与期望。

2005 年 12 月 5 日

目 录

《国学研究丛刊》总序	袁行霈 (1)
序 言	袁行霈 (1)
绪 论	(1)
第一章 汉赋与汉代都城制度	(16)
第一节 京都赋的兴起与东汉迁都之争	(16)
第二节 汉赋关于都城选址的讨论与两汉都城之文化 取向	(40)
第三节 汉赋关于都城规划的记述与两汉营国思想之 变迁	(66)
第四节 汉赋关于都城建筑的描写与两汉政治文化之 差异	(93)
第二章 汉赋与汉代校猎制度	(116)
第一节 汉赋中所见校猎之性质	(116)
第二节 汉赋中所见校猎之时间、地点及参与者	(131)
第三节 汉赋中所见校猎之程序	(140)
第四节 汉赋中所见校猎之作用	(148)
第五节 汉赋中所见校猎之弊端	(159)
第六节 两汉校猎制度的变迁与校猎赋主题的 演化	(167)
第三章 汉赋与汉代礼仪制度	(182)
第一节 汉赋所见两汉吉礼考	(182)

2		
目 录	汉 赋 与 汉 代 制 度	

第二节	汉赋所见两汉嘉礼考	(205)
第三节	汉赋所见两汉军礼考	(229)
第四节	两汉礼制变迁述略	(238)
第五节	两汉礼制变迁中的赋家与赋作	(270)
结 论		(299)
附论一	盖天说与西汉长安城的布局初探	(306)
附论二	“五时祀”略考	(315)
参考文献		(319)
附 图		(326)
后 记		(347)

绪 论

一 本论题的研究价值

焦循、王国维等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①，皆将赋作为两汉文学的代表。20 世纪以前，学者对汉赋论述颇多，常以点评、序论、赋话的形式出现，虽精见迭出，却较为零散，不成系统。^② 自 20 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汉赋的发端、形成、演变、特征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阐述；对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创作的研究亦不断深入；对其余赋家的作品也日渐重视。然而以往讨论汉赋，多集中于汉赋的特征、赋体的演进、作者生平的考证等方面，常常从文学角度进行分析。对汉赋与汉代文化、制度、学术、民俗等方面的关系，则重视不够。因此，一些学者在对 21 世纪汉赋研究的展望中，都强调需要开展“赋学的交叉和边缘研究”，主张从文化史等角度考察辞赋，以拓展其研究领域。^③

汉赋记录了两汉制度的许多方面。研究汉赋，如果将文本的解读和汉代制度的研究结合起来，则有较深广的讨论空间。在《诗经》

① 焦循《易余籥录》卷十七：“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王世贞、茅一相、张琦等亦有类似说法，可参见沈金浩《“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辨析》，《苏州大学学报》，1988 年第 4 期。

② 参见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开明出版社，1993 年版；踪凡《汉赋研究史述略》，《社会科学辑刊》，2002 年第 1 期等。

③ 总结 20 世纪汉赋研究的论著包括：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中华书局，2001 年版，163—181 页。费振刚主编《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之《赋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 年版，284—318 页。许结《二十世纪赋学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336—377 页。何新文《现当代赋学研究文献整理》，《辞赋散论》，东方出版社，2000 年版，232—273 页。阮忠《20 世纪汉赋研究专著综述》，《南都学刊》，2000 年第 3 期；《20 世纪汉赋研究评述》，《学术研究》，2000 年第 4 期等。

中,“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法,赋法有七百二十处,约占百分之六十。^① 赋本“敷陈其事而直言之”^②,汉赋对汉代制度的敷陈,更是务求广博,务加征引,远远超过其前的诗、骚以及同时的乐府和文人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赋对两汉制度进行了多侧面的描述,举凡宫室建筑、礼仪活动、山川形势、物产交通、民风民俗等,皆搜罗殆尽,以达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③的艺术效果。要对汉赋中如此丰富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必须熟悉汉代制度与文化,在文学与史学、哲学、考古学等交叉点上展开工作,而这是具有相当难度的。

将汉赋与汉代制度结合起来研究,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从一些赋作的序言中可以看出,汉人作赋,或以讽谏、或为美颂、或为论事,多追求其实用性^④,若其“无贵风轨,莫益劝戒”^⑤,则废而不作。有的辞赋是作者未成名时的进献之作,如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张衡的《二京赋》等,他们殚思竭虑,敷陈名物显示才学,借以表达对某些政策的看法。有的辞赋是为宦时传阅于朝廷,以陈说政治见解的,如杜笃的《论都赋》、班固的《两都赋》,是对当时的立都发表意见。因此,汉赋文本中关于两汉制度的描述和议论,不仅具有特定的政治意图,而且作者的态度也是严肃的,不能一概以夸夸其谈论之。

汉赋的主要作者,兼有学者的身份。清阮元《四六丛话·序》说:“综两京文赋诸家,莫不洞穴经史,钻研六书。”^⑥ 司马相如、扬雄皆编纂过字典辞书^⑦;班固为史学家,著录《汉书》、《白虎通》等;张衡为科学家,也曾参与修订汉纪^⑧;其他赋家也具有深厚的文化修

① 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朱熹《诗经集传》卷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影宋本,1958年版。

③ 《文心雕龙》卷二《诠赋》。《四部丛刊》本(下同)。

④ 参见拙文《略论汉赋美学目的之功利性》,《天中学刊》,2004年第1期。

⑤ 《文心雕龙》卷二《诠赋》。

⑥ 《研经室四集》卷二,《四部丛刊》本。

⑦ 司马相如《凡将篇》、扬雄《训纂篇》、《方言》等,见于《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下同),1721页。

⑧ 张衡熟悉两汉制度,曾参与修订汉纪,《后汉书》卷五十九本传云:“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驹骏等著作东观,撰集《汉纪》,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捡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后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版(下同),1940页。

养^①。研究汉赋,需要充分注意其创作活动与其所处学术背景之间的关系。仅就汉代制度而言,两汉赋家都相当了解熟悉,有的甚至参与了有关制度的制定和讨论,他们的作品,大量涉及当时的都城、校猎、礼仪等制度。借助汉赋可以考证这些制度,而研究这些制度又反过来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汉赋文本,进而对汉赋进行政治学、文化学的阐释,有助于探求汉赋演进的深层背景。

汉赋中关于制度的描述,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能认真甄别,完全可以用来补充汉代制度的研究。京都、校猎、礼仪(如籍耕、郊祀)等都是汉赋重要的内容,《昭明文选》甚至以此将汉赋分为几大类。这些内容,恰恰是两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其他赋家如枚乘、傅毅、崔骃、蔡邕、王粲等,也进行了大量的描写。这些制度的形态,是汉赋文本重要的表现内容;这些制度的变迁,是汉赋作者关注的焦点;这些制度演化的文化和学术背景,也影响着汉赋创作的倾向性。

另外,两汉辞赋创作的几个高潮,正是两汉制度酝酿、变化的关键时期,也是当时学术思想整合的转折时期。汉代制度变迁,常成为汉赋作者关注的焦点。例如东汉初年的迁都之争,促成了京都赋创作的高潮;两汉对校猎制度的不同认识,使校猎赋的主题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元封、元始、永平年间的礼制改革,从不同层面影响了汉赋的内容、风格和创作主题。所以,从汉代制度的变迁这一视角审视汉赋题材的变迁、主题的变化,能够更深入地揭示汉赋演进与发展的轨迹。

因此,本论题的意义在于:充分利用考古学、历史学、哲学以及诸如礼仪、军事、建筑等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对汉赋的都城、校猎、礼仪等题材进行系统的讨论,多角度、跨学科地对汉赋展开交叉研究,通过分析汉赋所记述的制度,探讨汉代制度变迁与汉赋主题、艺术形态及创作倾向的关系,以期开拓汉赋研究的新局面。

^① 如刘向、刘歆校书东观;马融为经学家;蔡邕也有史才,《后汉书》卷六十本传云:“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2007页。

二 关于都城、校猎、礼仪制度的研究现状

本论题不仅对汉赋进行文学研究,还涉及汉代都城、校猎、礼仪等制度,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制度史研究。现将有关制度的研究状况分述如下:

(一) 汉代都城制度

目前的两汉都城制度研究,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①,大家普遍认识到两汉都城在形制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对这种差异的讨论,多引用一般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没有全面、系统地利用汉赋关于两汉都城制度的记述。^② 由于东汉京都赋的产生,是以论都之争为背景的,赋家直接关注两汉都城的差异,对长安、洛阳的地理位置、文化蕴义、营造思想、宫室建筑以及两汉的兴衰得失,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对东汉立国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③ 赋家的描写,代表了当时的学者对都城制度的认识,可以用做探讨两汉都城制度变迁最为原始的材料。

东汉初期迁都之争的深层背景如何? 两汉人如何看待长安、洛阳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蕴义? 如何评价两汉都城的营造观念? 这些观念对两汉都城的布局与形制有何影响? 两汉宫殿和礼制建筑的风格是什么? 其变化的背景如何? 这些是京都赋关注的重点,我们可以将这些记述作为切入口,通过比较,讨论这些赋作所记述的都城制度及其文化蕴涵,分析长安、洛阳在地理位置、布局规划、建筑形制等方面存在的不同,考察两汉都城制度上所发生的一些变革,理顺两汉都

^① 大致情况参见赵化成、高崇文等著《秦汉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孙进己、苏天钧、孙海主编《中国考古集成》(华北、西北卷战国秦汉部分),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版等。

^② 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在探讨两汉制度时,有时也曾引用京都赋作为资料,若刘运勇的《西汉长安》,王仲殊的《汉代考古学概说》,史念海的《中国古都和文化》,刘庆柱、李毓芳的《汉长安城》,杨宽的《中国都城制度史研究》等著作,都曾引用汉赋以资论述。这种引用只是局部的、片段式的,是以汉赋来印证考古发掘或历史记载,而没有系统地考察汉赋作者对两汉都城制度的整体对比。

^③ 如马积高先生认为:“这场争论涉及到用什么思想建国的問題,在东汉初期有着头等重大的意义。”《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下同),101页。

城变化的脉络。这是一项具有综合性学术价值的工作。

(二) 汉代校猎制度

校猎是古代军事训练的重要方式,也是历代军礼的主要内容。先秦已有军训性质的田猎活动,魏晋以至明清,校猎都是军事训练的重要形式,具有特定的制度形态和礼仪规范。作为承前启后的一环,两汉是校猎制度形成与演变的关键时期。但历代对两汉校猎制度缺乏系统的研究,《史记》、《汉书》、《后汉书》没有对讲武、校猎活动进行系统记载。郑樵《通志·礼略三》也说:“周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行搜、苗、猕、狩之礼。汉、晋以来,有阅兵之制,而史阙田猎之仪。”^①杜佑《通典·军礼》对两汉校猎亦语焉不详。两汉《会要》也仅数例大要。《中国军事制度史》虽谈及秦汉校猎有练兵和操演军阵的作用,也仅点到为止,对两汉校猎时间、地点、参与者以及校猎程序、意义,也缺乏系统总结。^②其他研究两汉礼仪制度的著作,也都没有详细讨论两汉校猎制度。^③

两汉校猎制度研究的相对薄弱,主要原因是史料缺乏。先秦田猎制度在甲骨卜辞、《周礼》、《左传》等文献中,都有很多记载。而唐宋以后的校猎,史载亦详。唯两汉校猎,史书中草蛇灰线,不甚详明,以致郑樵做出“史阙”的判断。倘若注意汉赋,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自枚乘《七发》列“校猎”为“七事”之一,两汉“七体”多侧面描绘了不同时期的校猎活动。^④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对比诸侯田猎与

① 《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下同),726页。

② 《中国军事通史》叙述两汉时,没有涉及校猎。李际均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军事制度史·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卷》虽谈及秦汉校猎有练兵和操演军阵的意义,但于校猎之基本情况、有关程序等制度化的特点,无系统阐释。陈高华、钱海皓主编,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

③ 如陈成国的《中国礼制史》、杨志刚的《中国礼仪制度研究》等,主要讨论两汉校猎的娱乐和荒淫,没有将作为娱乐的田猎和作为军事训练的校猎区别开来深入讨论。而其余讨论田猎的论文,如杨宽《“大搜礼”新探》等,较多集中在先秦田猎制度的研究,尚未顾及到两汉校猎制度。

④ 枚乘《七发》,叙音乐、饮食、车马、巡游、校猎、观涛、闻道七事。今存七体,残缺者多,然能辨多拟上述之事。傅毅的《七激》、桓麟的《七说》、王粲的《七释》尚存校猎描写之片段。

天子校猎之不同,初叙武帝校猎之仪。^①此后,扬雄有《校猎赋》^②、《长杨赋》,张衡、王粲分别作《羽猎赋》,马融有《广成颂》,应玚有《校猎赋》、《驰射赋》等。班固、张衡等人的京都赋,都将校猎作为两汉重要的制度进行对比,全面铺叙了校猎的时间、地点、程序以及得失等。这些作品集中描写校猎制度,不是偶然的,也不全是用来讽谏。这就需要将校猎制度和校猎赋结合起来讨论。

汉赋中大量存在的校猎描写,完全可以作为校猎制度研究重要的参考资料。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描写,分析两汉校猎的性质,还原其制度形态,讨论其价值和意义,补全古代军事制度演变的一环,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三) 汉代礼仪制度

两汉礼制,上承周秦,下启魏晋,是“统一帝国礼制初步确立的时期”。^③古代礼制,多围绕“三礼”进行。对两汉礼制的研究,远逊于对先秦礼制研究。其原因也在于可资参考的史料太少,涉及两汉礼制的书籍如《汉旧仪》、《汉官仪》、《汉官典职仪式选用》等,唐时均已散佚,无法与“三礼”为代表的先秦礼书相比。^④而《史记》、《汉书》所存封禅、郊祀等记载,以及《后汉书》的礼仪、祭祀等陈述,远不如唐书、宋史所记详切。《通典》、《通志》、《西汉会要》、《东汉会要》等归结两汉礼制,甚至不如周制详细。两汉礼书不全,又互相抵牾;史汉记载,不甚明晰,可参考、佐证、勘别的资料有限,影响到两汉礼制研究的深入。如果能借助新的资料,汉代礼仪制度的研究还能向前推进一步。

20 世纪的两汉礼制研究,大体从两个方向入手:

第一,在探讨某项礼制时,间或提及两汉礼仪,如《中国祭祀流源

① 即《子虚》、《上林》二赋,《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言:“请为《天子游猎赋》。”《文选》分而为二,龚克昌先生辨之甚明,今以原题称之,参见其《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 年版(下同),86—90 页。

② 扬雄《校猎赋》,《文选》及《全汉赋》皆作《羽猎赋》,《汉书》卷八十七本传及赋前自序题为《校猎赋》,兹从《汉书》。

③ 参见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下同),121—155 页。

④ 《旧唐书》卷二十一《礼仪一》说“西汉一朝,曲台无制”、“东京旧典,世莫得闻”,可见唐宋之间,两汉有关制度已经不能详考。《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版,816 页。

考》、《古代郊祀之礼》、《先秦两汉习射风气》、《中国古代籍田礼仪种种》等论文^①，以及《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中国历代宾礼》、《中国历代祭礼》等专著，其讨论礼制变迁，与《通典》、《通志》大体相类，两汉部分较为简略。

第二，专门考察两汉礼仪制度，如《汉代婚丧礼俗考》、《汉代丧葬制度考》、《中国礼制史（秦汉卷）》等^②，对汉代礼制进行系统的阐述，这类论文和著述数量有限。或因创作较早，未能利用新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等出土资料，尚有很大的补充余地；或讨论有关礼制，仍遵循《通典》、《通志》及《两汉会要》的模式，侧重讨论制度的变更，如某年增、某年减、某年何议等，对制度的基本状况，诸如郊祀的用品、朝会的仪式等，还缺乏细致的讨论。^③

倘若重视和利用汉赋中的礼制描写^④，不仅可以获取到以往忽略的一些记述，而且能发现许多有价值的线索。并可利用不同时期的描写，对某些礼制的演变细节进行分析。如扬雄《甘泉赋》、《河东赋》分别写西汉祭祀泰一、后土，崔骃《四巡颂》状章帝巡狩，《东京赋》顺次东汉元日朝会、祭祀天地、大射、校猎、大雩等仪式等。这些描写生动、细腻、详切，完全可以用来印证和补充有关文献的记载。这样，我们既可以利用汉赋来考察汉代礼仪形态，也能够分析这些礼仪制度变迁的文化背景，丰富汉代礼制研究思路，拓展其研究空间。

① 蔡介民《中国祭祀流源考》，《新东方》第二卷第5期。黎正甫《古代郊祀之礼》，《大陆杂志》第三十三卷第7期。武普照、王忠君《先秦两汉习射风气》，《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杨燕民《中国古代籍田礼仪种种》，《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②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杨树达《汉代丧葬制度考》，清华学报单行本，1932年版；陈成国《中国礼制史·秦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

③ 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不少讨论两汉礼制的文章，如杨树达、胡嘉、劳干、王汝棠等分别对汉代的丧葬、婚俗、社祀、座次尊卑等进行了讨论。两汉礼制研究的文章，较多集中在这一时期。查《先秦史研究纲要》、《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含《续编》、《三编》），《中国史研究指南》第一册等，可以看出，关于礼仪制度的研究，较多围绕“三礼”进行，对两汉礼制的研究，远逊于先秦。

④ 如陈成国论述“西汉军礼田狩礼”时，引用了部分汉赋作为材料，以补充史料记载之不足，惜未能展开以全面讨论两汉校猎制度。其余制度考察，则很少利用汉赋，而其他学者的礼制研究，也都没有充分利用汉赋的描写。

上述制度,是汉赋中描写的重要内容,也是两汉制度可以继续深入讨论的领域。所以,本论题的意义还在于:利用汉赋中关于制度的描写,来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辅助解释考古资料,推动两汉都城、校猎、礼仪制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三 关于汉赋作品的史料价值

8

绪
论

汉赋与汉代制度

汉赋中大量描写的汉代制度,目前学术界尚未系统加以利用。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汉赋“夸张”、“虚构”等文学手法,从而影响了对其真实性的信任。将汉赋与两汉制度结合起来研究,需要把握如下问题:

(一) 关于汉赋的“文学”性质

两汉时期,文史哲尚未完全分开,其时所谓的文学,并非近代意义上的“文学”,而较多指称“文章”或“学术”。故虽有夸饰之风,仍注重其实用性。秦汉文章,如《谏逐客书》、《过秦论》等,也注重藻饰,措辞雅丽;两汉典籍,如《淮南子》、《汉书》等,亦铺排详赡,言语整饬。这是两汉的特定文风,不能因为其形式的华美而否定其内容的真实。

从汉赋作者本意来看,他们主要将汉赋用于宣扬政教,“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①。汉赋创作,或用于彰显才能,铺排物类以证其博学,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扬雄的《蜀都赋》,其中引物叙事,不致太过虚妄;或用于劝谏帝王,畅言以论行政得失,如扬雄的《校猎赋》、杜笃的《论都赋》,其中虽不免修辞夸饰,然而在时间、地点、程序、性质的界定上,仍不失谨慎,以免诬而不实,影响到赋作的现实功用;或用于议论国事,以明辨是非,如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马融的《广成颂》,其中用语引物更为细密,赋作者必须先弃不实之说,展开论述,才能服众。因此,赋中虽然有部分修饰,但在制度性的内容上,尚不致随意虚构。

^① 班固《两都赋》序,《文选》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3页,下文所引《两都赋》皆本此。